中美产业不对称依赖与冲突的影响研究

李文琪，夏 敏
（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 100872）

摘 要：近年来，全球产业链的结构正在发生变化，在当前逆全球化浪潮的冲击下，美国政府力图进一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出台了限制中国产业竞争优势、促进美国技术发展的一系列相关举措。从中美相互依赖的角度来看，以高附加值的科技产品出口为代表，中国制造业附加值的增长率近年来保持较快稳定增长，并已经通过快速的工业升级成为了复杂全球价值链中一个新的中心，中国制造业的升级以及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加深改变了美国对中美间相互依赖关系的认识，中美之间产业竞争愈发激烈对美国先进制造业战略的形成产生重要影响。我国应加大核心科技的研发力度，通过国际国内双循环激发创新生态系统活力，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突破。

关键词：中美关系；产业链；产业升级；不对称依赖
中图分类号：D815 **文献标识码**：A DOI：10.3772/j.issn.1009-8623.2021.12.012

全球产业链结构近年来发生了重要的变化，中国在产业链中发挥越来越突出的作用。新冠疫情肆虐之下，中欧投资协定、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签署，则更加凸显了中国助力推动全球投资和经贸增长的重要作用与贡献，提升了各国在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的当下与全球伙伴共克时艰、携手共赢的意愿。而美国近年来为促进制造业回流，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希望将美国企业重新引流回本国。新冠疫情发生之后，一些国家由于感受到了过于依赖中国制造业的危险性，正在着手评估把位于中国的产业迁移到别国或是迁回本国的成本，追求产业链的多元化成为了新的趋势，美国也更加深刻地意识到降低对全球产业链依赖的重要性，保障供应链安全成为世界各国的关注重点。目前，全球经济正在发生结构性的调整[1]，中美产业链相互依赖关系的变化对美国相关政策的制定产生了重要影响[2]。在此背景下，美国利用优势地位出台政策，对中国高新技术企业如华为、中兴、大疆、TikTok 等进行限制打压，反映了其对部分高技术产业优势丧失的焦虑。

1 从全球价值链视角看中美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关系

1.1 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

从全球价值链网络角度来看，中国与其他经济体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中国产业的升级重塑了中国与其他国家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比较 2000 和 2017 年，欧洲和北美价值链网络似乎并未发生显著的变化。剧烈的变化发生在亚洲，中国取代了日本的位置，并且通过最终商品附加值出口贸易成为了世界供应的中心。中国不仅与其他中心（美国和德国），还与亚洲的邻国（日本、韩国与几乎所有亚洲国家）以及新兴国家（俄罗斯、巴西、印度）有着重要的联系。在比较附加值流动的广度时，我们发现中国和其他主要地区中心以及周边国家之间的联系变得更为紧密[3]。

第一作者简介：李文琪（1997—），女，在读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产业经济、国际经济。
通讯作者简介：夏敏（1977—），女，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际政治经济学和比较政治学。邮箱：xiamin325@ruc.edu.cn
收稿日期：2021-10-04

同时，随着经济全球化的发展，中国产业不断升级，中美产业链以及中国与全球其他地区产业链的相互依赖关系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区域内贸易在亚洲工厂的增长部分折射出了中国和其他亚洲经济体的升级，与之相比，区域内贸易在欧洲工厂和北美工厂略有减少，区域间价值链贸易表现出了与亚洲工厂较紧密的联系，中国已经成为传统贸易与简单全球价值链网络的一个重要中心。

如图 1 所示，随着贸易变得更加集中于地区伙伴之间，美国在全球价值链网络图像中与一些国家的联系相对减弱。简单全球价值链活动更加以欧洲、北美和亚洲内部为中心，与美国紧密联系的国家数量减少，大多数的周边贸易联系转移到了中国。从中国增加值出口数量以及与其他国家建立强联系的数量来看，中国出口的中间产品迅速增长，在替代日本地位的同时承担了部分美国的角色，成为第二大供应中心[4]。

当前，中国已经在诸多产业链中发挥关键作用。例如，钢铁产业是中国地位不容置疑的行业之一，中国是钢铁生产的领导者，在全球钢铁供应链中取代中国几乎绝无可能。2019 年中国钢铁产量占全球产量的 50% 以上，欧盟以约 10% 的份额位居第二，北美自由贸易区国家、日本、印度和独联体国家的份额不超过 7%[6]。中国钢铁生产的任何停产情况都会使世界各国的国家难以获取相关原料，钢铁零部件的制造生产面临困境，这将影响整个世界重工业的发展。纺织生产是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占有重要份额的另一行业，中国不仅已经与本地区其他国家建立了有效的生产网络，而且在全球纺织品生产中发挥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新冠疫情面前，中国实现复产意味着中国仍然是纺织业的领头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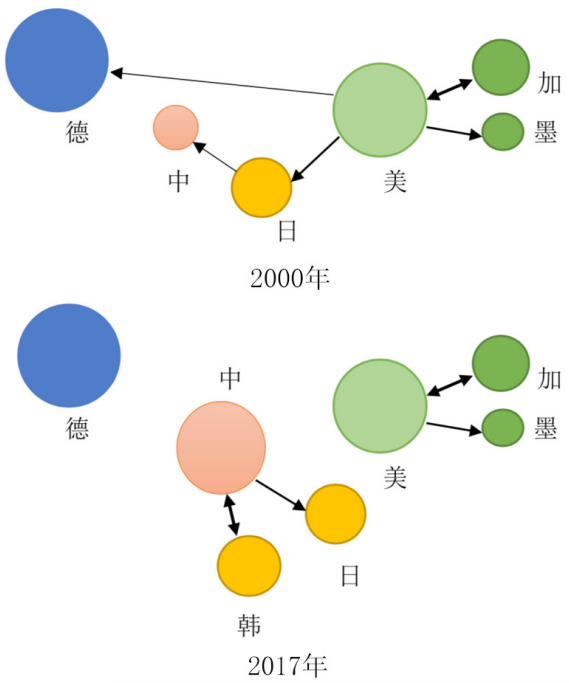

图 1　全球价值链网络 (complex GVC trade networks)[5]

注：圆圈大小代表附加值出口的数量，圆圈之间线条的粗细代表各对贸易伙伴间的附加值流动量。

此外，在复杂的全球价值链网络中，亚洲和北美产生了更加强大的地区联系，地区伙伴之间关系更为紧密。自 1990 年以来，东亚地区区域联系已经大大加强，相对于与全球的联系，更加集中于地区内部。与之相对，北美地区在逐渐成为一个整体的同时，在某种程度上更加依赖全球伙伴。换言之，更多的国家，尤其是亚洲国家，已经对中国附加值的供应变得高度依赖，并且通过全球价值链对于附加值需求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依赖。由于中国的购买力迅速增长，中国已经成为最终产品附加值贸易的最重要需求者之一。尽管中国的人均 GDP 仍然低于大多数发达国家，但考虑到中国经济增长的潜能、目前扩大开放的进程以及人口数量，不难想象中国作为最终商品的购买者将会成为全球贸易网络中一个重要的需求中心。毫无疑问，世界经济相互依赖以及国家影响力的分配模式将会发生显著的变化，中国将发挥更为重要的作用。

以更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出口和进口为代表，中国制造业附加值的增长率近年来保持较快稳定增长，并且中国已经通过快速的工业升级成为了复杂全球价值链中的一个新中心。从在全球价值链参与中的角色来看，中国由承担有限的制造业角色发展为先进制造与服务业角色，对于进口零部件以生产最终产品的依赖度降低，中间产品进口占中国商品输出的比重从 20 世纪 90 年代的 50% 左右下降到 2015 年的约 30%。这清晰地反映了中国并非仅是一个出口大量最终产品的工厂，而是已经通过快速的工业升级成为了一个新兴的超级大国。

在信息通信技术（ICT）产业中，中国成为了传统贸易网络中最大的需求中心，日本的存在感迅

速降低，由 2000 年传统贸易网络中的全球供应中心和简单价值链地区供应中心转变为 2017 年亚太地区的边缘国家。这些变化折射出在美国和日本 ICT 产业所谓的工业空心化现象，这些产业伴随着大量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从这些国家迁往中国，投资的增长对中国的 ICT 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从全球汽车工业来看，全球汽车产业链在很大程度上依赖汽车零部件供应链，超过 80% 的世界汽车供应链与中国相联系 [7]，从中国进口的汽车零部件价值超过 340 亿美元 [8]。从全球范围内依赖价值链活动的汽车产业情况可以看到，中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汽车行业的全球供应链对中国经济状况的依赖性很强。汽车分包商的销售额在 2020 年 2 月下降了 92%，其主要原因为中国新冠疫情期间生产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包括日产、通用等外国汽车制造商在内的多家在湖北或其附近运营的汽车制造商被迫停产。全球汽车供需可能在中国恢复生产后达到相对平衡状态，中国在汽车产业中发挥的作用将进一步加强。因此，中国在汽车产业全球价值链中不可或缺。

全球价值链的这种转变也反映在中国出口产品的技术复杂性的不断变化上，以及从低技术产品转向以中高技术产品为主的医疗器械产业上。从医疗器械产业来看，美国产业的国际转移使得美国对中国产业的依赖程度逐步加深，美国国际贸易委员会发布的《中国在全球医疗器械价值链中的攀升》报告称，中国在医疗器械全球价值链上的进步以及国内高技术医疗器械产量的增加，可能预示着对国外生产商的依赖减少 [9]。总体来看，以更加高附加值的中间品出口和进口为代表，中国已经通过快速的工业升级在复杂全球价值链中占据了自己的位置。

为了进一步具体分析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参与度，根据 Wang 等 [10] 提出的分析框架，采用前后向联系的参与度指标来反映一国某行业参与全球价值链的程度。利用亚洲发展银行 2010 年到 2017 年的投入产出表数据，计算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 [11]。计算结果表明，从 2010 到 2017 年，中国中高技术制造业的前向参与度与后向参与度降低，这显示出我国依赖中间品出口和进口的程度下降，中高技术制造业逐渐倾向于国内生产，并且通过国内广阔的市场推动经济发展 [12]。

1.2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关系在全球价值链分工下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借鉴林珏等 [13] 关于中美综合依赖度的计量框架，构建中美经济相互依赖的计量框架，具体指标如表 1 所示。

表 1 中美经济相互依赖指标与权重

指标	含义	公式	权重	重要性得分
贸易依赖度	双边贸易额占中国 GDP 的比率，衡量贸易依赖	TC=BT/GDPC（BT 为中美双边贸易额，GDPC 为中国 GDP 值）	0.4	4
	双边贸易额占美国 GDP 的比例	TA=BT/GDPA（BT 为中美双边贸易额，GDPA 为美国 GDP 值）		
投资依赖度	美国对华直接投资占中国吸引外资总额的比率，衡量投资依赖	I=IA/FIC（IA 为美国对华直接投资额，FIC 为中国吸引外资总额）	0.3	3
经济自由化	中国海关对进口美国高新产品征收关税税率，衡量经济自由化导致的依赖	Cc=TC（TC 为中国海关对进口美国高新产品征收关税税率）	0.2	2
	美国海关对进口中国高新产品征收关税税率，衡量经济自由化导致的依赖	Ca=TA（TA 为美国海关对进口中国高新产品征收关税税率）		

续表

指标	含义	公式	权重	重要性得分
技术依赖度	中美机械设备产业内贸易指数	1−|E1−I1|/(E1+I1)（E1 为机械出口额，I1 为机械进口额）	0.1	1
	中美电器设备产业内贸易指数	1−|E2−I2|/(E2+I2)（E2 为电器出口额，I2 为电器进口额）		

数据来源：《中国统计年鉴 2019》、美国商务部、世界银行、UNCTAD-TRAINS 数据库、UNcomtrade 数据库。

中美经济依赖指数计算结果显示，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呈现上升趋势，在 2018 年出现了小幅度的下降。其中，中国对美国的贸易依赖度呈现出下降趋势，而美国对中国的贸易依赖度相对稳定。机械设备产业内指数呈现出上升趋势，表明中美技术水平差距有减小的趋势，而从电子设备产业指数来看，其攀升趋势弱于机械设备产业。

中国电气设备制造业，机械设备制造业以及计算机、电子和光学产品制造业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正在缓慢上升，并逐渐缩小与美国在全球价值链位置的差距，这一转变反映在相应时期外国直接投资的类型上。在 2003—2009 年，外国直接投资主要用于制造业和装配业，而制造业和装配业是全球价值链中附加值最低的部分；而当前，大部分投资用于研发、分销、营销和销售以及售后服务，所有这些活动都被视为高附加值活动。尽管美国对中国企业的创新能力以及核心技术的进步进行遏制和阻挠，但中国制造业还是不断向上游攀升。

2　中美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依赖对冲突的影响

2.1　美国相关政策变化

由于经济与政治的交互作用，中美之间的这种经济相互依赖牵动着政治行为的变化。如表 2 所示，美国自金融危机后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促进制造业回流美国，通过关税加征等手段打击中国，并致力于巩固其制造业的世界领先地位，而其政策制定过程很大程度上受到中美相互依赖关系的影响。美国作为世界霸权国，在全球产业链中发挥中心作用，然而，中国凭借扩大开放、制造业升级以及巨大的市场体量，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影响力不断上升，中美不对称相互依赖的态势正在不断发生变化 [14]。在美国对中国依赖加深、中国在中美不对称相互依赖中的权力相对上升的过程中，美国相关政策风向也在发生变化，从积极与中国接触逐渐转向遏制中国，这反映了美国对中国产业升级的忧虑。

中国在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后融入了全球价值链，越来越多的国家对中国附加值的供应高度依赖，并且通过全球价值链对于中国的附加值需求产生直接或者间接的依赖，美国对中国的依赖度也在加深。同时，中国实现了在全球价值链中从有限的制造业升级为先进制造业的攀升，美国正在采取措施维护自身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主导地位。

2020 年以来，美国政府力图进一步降低对中国供应链的依赖，对中国在全球价值链中的位置提升设置更强的壁垒与障碍，同时出台了应对中国威胁、促进美国技术发展的一系列相关举措。美国商务部取消民用终端用户许可证，扩大涉及半导体制造设备等技术的限制范围，并发布实体清单、《中国公司监督法案》等，将华为利用美国技术生产的芯片列入美国《出口管理条例》的限制范围内 [15]。

新冠疫情大流行加剧了美国对中国技术实力的担忧，由此产生的政策辩论大多集中在限制中国能力以及加强美国自身技术能力的方法上。《无尽的前沿法案》（The Endless Frontier Act）指出，科技创新是美国的核心力量。自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以来，美国一直是无可争议的全球技术领导者，得益于这种技术优势，美国人享受了高收入的工作、经济的繁荣以及更高的生活质量。在人工智能、量子计算、先进通信技术以及先进制造业等技术方面的胜者将会成为未来的霸权国家 [16]。因此，美国联邦政府未来将加大对 5G、人工智能、先进制造

表 2　美国相关政策

时间	政策	内容
2009 年 12 月	《重振美国制造业框架》	从研发、投资、劳动力、基础设施等方面推动重振制造业
2010 年 8 月	《制造业促进法案》	通过税收优惠吸引制造业回流
2011 年 2 月	《美国创新战略：确保国内经济增长和高质量就业》	优先突破先进制造业
2011 年 6 月	《确保美国先进制造的领导地位》	提出先进制造业合作关系（Advanced Manufacturing Partnership）先进制造业计划（Advanced Manufacturing Initiative）
2017 年 1 月	《制造业就业主动性计划》	增加制造业就业
2017 年 12 月	税改方案	通过减税重新吸引美国制造业
2018 年 4 月	贸易战	实行贸易保护政策
2019 年 2 月	《美国未来工业发展规划》	确保美国主宰未来工业
2021 年 5 月	《无尽前沿法案》	重振美国创新经济，支持全国范围内的研发活动，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保持美国产业竞争力

等先进技术领域的研发、商业应用和教育培训的投入，保持领先中国的水平，促进美国对华产业“脱钩”和技术竞争之间的相互结合，防止外国竞争者赶超美国在尖端技术方面的领导地位。

美国智库美国亚洲协会中美关系中心发布的《应对巨龙：中国是跨大西洋的挑战》（Deal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 as a Transatlantic Challenge）报告[17]以及美国国会两党合作的中美科技关系工作小组发布的《应对中国挑战：美国的科技竞争新战略》（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 New American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报告将中国作为美国技术发展的重要威胁，指出美国面临着来自中国的强大竞争。为应对中国的挑战，美国需要一个清晰的科技创新战略，以增强美国的国家竞争力，维护国家安全。一些美国政客认为，美国应减少与中国的科学和商业合作，以防止中国超越美国，摘得技术的王冠。“鉴于中国挑战的复杂性和紧迫性，美国有必要实施针对特定技术的智能风险管理策略。当前，美国必须加强对国内科技基地进行的投资和政策调整，并制定一种新的全球合作方式，促进与盟友的合作，加强美国国内对数据隐私和安全的监管，在不过度牺牲开放利益的情况下，将中国带来的安全风险降至最低。”[18]

2.2　美国加强对华遏制的原因分析

中美之间的相互依赖不仅为中国带来了发展升级制造业的机会，同样也能够为美国经济带来收益[19]，那么美国为何追求降低对中国的依赖？过去几十年间，在中美非对称依赖关系中权力变化的结构效应与财富增加对国家造成不同的满意效果（Satisfying Effect），使权力变化影响国家间关系，中国的财富增加使美国提高了警惕。近年来，为了在第四次工业革命价值链重塑以及各国争夺新技术制高点的过程中保持世界领导地位，美国试图减少对中国生产链的依赖，增强对贸易伙伴国的威慑能力。

从全球战略布局角度来看，美国对华经济政策的变化受到其自身与中国相互依赖度以及世界其他国家与中国相互依赖度变化的影响。美国高度关注中国实现技术自主的进程，当今中美两国开发和利用新技术的能力将决定中国究竟能在多大程度上崛起，以及美国在多大程度上真正陷入衰退[20]。对美国来说，其对于中国在全球价值链的位置的认知可能更为重要，因为人们普遍认为技术优势是其主要竞争优势之一。如果美国被认为在新兴技术领域落后于中国，这将使得美国一直以来所享有的创新光环面临挑战，而这种光环在过去的战略竞争中使

美国受益匪浅。

此外，中国与其地区贸易伙伴国家建立了较强的依赖关系，而美国认为一个没有真正地区对手的竞争者将可以在世界各地施展权力，对于相互依赖的前景预期将会变差。观察在中美相互依赖关系中两国位势的相对变化，冷战结束后，美国对中国具有绝对优势，此时美国对中美相互依赖的预期较为乐观[21]，对中美合作的态度相对积极，而这种绝对优势随着美国实体经济空心化和中国制造业的崛起逐渐减小。因此，随着中美产业的紧密依赖关系不断发展，相对于冷战后的霸权自信，美国倾向于回归更加现实主义、更加克制的对外战略，开始减少在欧洲和中东的开支，加强自身抗衡中国的能力[22]。

中国的崛起也正迫使美国更加密切关注亚洲的权力平衡政治。为了制衡中国，美国试图在亚洲加深与日本、韩国、印度等的伙伴关系。但美国的亚洲联盟建设似乎并非一帆风顺，亚洲地区贸易伙伴对中国产业已经形成了较强的依赖性，亚洲国家并不情愿损害他们与中国的产业依赖关系。这些地区权力希望美国能够承担更多的责任，认为地区联盟的紧密结合以及保障各个成员公平的利益分配需要在美国领导下来完成。

当对与中国的相互依赖预期转向悲观时，美国支持打压中国制造业、将重点转向美国国内建设的声音促进了美国加强构建自身产业链战略的形成。美国认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纽带给美国带来了脆弱性，对于与中国之间的贸易预期情况变差。考虑到这些新的现实情况，美国不甘心安于现状，即国际体系已经超越了冷战后的单极格局，并正在转向一个需要通过新的政策工具应对相互依赖和竞争的时代[23]。美国政策制定者将会更倾向于制定以国家利益为原则、更加强有力的竞争战略[24]。

3　启示与建议

中美产业链相互依赖程度的转变，牵动了美国的敏感神经，并反映到了其相关政策以及战略布局的变化上[25]。尽管中美之间的经济相互依赖能够促进中美双方实现互利共赢，增加绝对收益，然而，在中美博弈中，美国对中国威胁的未来预期转向相对悲观导致美国使用政治权力影响经济活动以维持其世界领导地位。可见，美国对中国的相关经济遏制战略与其政治考量密切相关，经济相互依赖关系受到政治信息传递的影响。如果一方发出的信号有利于对方形成正面积极的估计，认为未来双方愿意维持良好的合作关系，那么其对于未来的预期将会变好，从而降低冲突的概率。因此，中美之间应加强沟通交流，释放良好的政治信号，避免错误判断。同时，我们应当意识到，美国试图采取单边主义来构造一个使得美国利益最大化的新的全球生产链体系，不仅对布局在中国的高附加值产业、高技术产业造成了巨大挑战，也对中国中低端制造业的发展形成了威胁。美国近年来将相对低端制造业回流到本国的产业链战略，意味着美国希望在遏制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同时从产业链中攫取最大的利益[26]。

对中国而言，美国的相关政策不仅带来了挑战，也是倒逼中国进一步掌握核心竞争力的机遇。我们应重视过度依赖低端要素参与全球价值链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风险，并基于将本地与全球知识溢出相结合的创新战略推动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首先，加大高技术产业的自主研发力度，促进地方产业集聚，培育自主创新能力。第二，通过国际国内双循环激发创新生态系统活力，在开放秩序中吸纳国际科技资源，促进与地区盟友的科技合作，防止我国制造业受到分工锁定作用而被限制在全球价值链的低端。在全球价值链中位置的上升与国家创新能力的提升存在一定的正相关关系，全球价值链的参与在中等水平以上对国家核心科技的进步存在积极作用。沿着全球价值链向上游移动将会在承担高附加值和技术密集型活动的过程中获得更多的价值，这不仅符合我国等发展中国家参与全球价值链的最佳利益，也会对高水平的产业创新产生促进作用。第三，利用经济外交增强我国在为新兴技术制定关键标准和规范的国际机构中的影响力，防控美国利用盟友孤立中国、阻碍中国高技术产业发展的风险。第四，我国应当从美国的产业发展过程中吸取经验教训，警惕对外直接投资可能带来的国内产业空心化[27]，充分利用我国丰富的资源，促进国内产业链的发展，以弥补逆全球化浪潮下全球产业链的不足。第五，随着美国新一届政府上任，中美经贸冲突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有所缓和，中国应加强与美

国的合作，共克时艰，携手同行，推动世界经济从疫情打击下尽快复苏，走向更为美好的未来。

综上所述，中美在全球产业链中是相互依赖而又冲突竞争不断的利益共同体。为应对美国科技产业政策的打压、防止被锁定在中美产业链与全球价值链的低端，中国产业应尽快向全球价值链上游移动突破。■

参考文献：

[1] 新华网 . 世贸组织预测：今年全球贸易将缩水 13% 至 32%[EB/OL].（2020-05-01）[2021-04-08]. http://www.xinhuanet.com/fortune/2020-04/08/c_1125830175.htm.

[2] 罗伯特 • 基欧汉 , 约瑟夫 • 奈 . 权力、相互依赖与全球主义 [J]. 战略与管理，2002（04）：63-76.

[3] World Trade Organization. Global Value Chain Development Report 2019: Technological Innovation, Supply Chain Trade, and Workers in a Globalized World[R/OL]. (2020-08-22)[2021-03-15]. https://documents.worldbank.org/en/publication/documents-reports/documentdetail/384161555079173489/global-value-chain-development-report-2019-technological-innovation-supply-chain-trade-and-workers-in-a-globalized-world.

[4] 余丽丽，潘安 . 价值链互动与反馈视角下中国部门增加值出口攀升研究 [J]. 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1，38（1）：61-82.

[5] Hao Xiao, Bo Meng, Jiabai Ye, Shantong Li. Are global value chains truly global?[J]. Economic Systems Research, 2020，32(4)：540-564.

[6] Danciu V. The global value chain in coronavirus era: an impact approach[J]. The Romanian Economic Journal, 2020(76): 2-23.

[7] Miller S. COVID-19 and value chains: diminishing return from trade policy[EB/OL]. (2020-08-22)[2021-03-15]. https://www.csis.org.

[8] Harbour L. The coronavirus impact on the global automotive supply chain[EB/OL]. (2020-08-22)[2021-04-15]. www.forbes.com.

[9] Mihir T. China climbs the global value chain for medical devices 2018[EB/OL]. (2021-01-06)[2021-03-20]. https://www.usitc.gov/journals.

[10] Wang Z, Wei S J, Xu X D, et al. Measures of Participation in Global Value Chains and Global Business Cycles[R]. Boston: Nber Working Paper, 2017.

[11] 李鹏飞，游子安 . 全球价值链下中国制造业的分布特征与演变趋势 [J]. 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20，53（4）：39-45，127.

[12] 王秋红，李文文 .GVC 参与度对中国制造业出口国内附加值的影响研究 [J]. 价格月刊，2020（4）：70-76.

[13] 林珏，谢汶莉 . 中美非对称相互依赖与权力变迁的实证分析 [J]. 世界经济研究，2015（10）：44-53，128.

[14] 沃尔兹 . 国际政治理论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

[15] 赵明昊 . 新冠肺炎疫情与美国对华战略竞争的深化 [J]. 美国研究，2020，34（4）：20-44，5-6.

[16] Association of American Universities. AAU president applauds “Endless Frontier Act” for substantive investments in research[EB/OL]. (2020-12-22). [2021-03-27]. https://www.aau.edu/newsroom/press-releases/aau-president-applauds-endless-frontier-act-substantive-investments.

[17] The Asia Society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The Bertelsmann Stiftung, George Washington University’s China Policy Program. Dealing with the dragon: China as a transatlantic challenge[EB/OL]. (2021-01-06)[2021-06-29].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Dealing%20with%20the%20Dragon_Report_25.06.20.pdf.

[18] The Asia Society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Meeting the china challenge: a new American strategy for technology competition[EB/OL]. (2021-01-06)[2021-11-16]. https://asiasociety.org/sites/default/files/inline-files/report_meeting-the-china-challenge_2020.pdf.

[19] 曼昆 . 经济学原理：微观经济学分册 [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2：56-70.

[20] Braden E. US-China competition in defense technological and industrial development: implications for the balance of power over the long term[J]. SITC Research Briefs, 2017(9): 1-3.

[21] Walt S. The end of hubris and the new age of American restraint[J]. Foreign Affairs, 2019, 98(2): 26.

[22] 科普兰 . 经济相互依赖与战争 [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8：36.

[23] Schadlow N. The end of American illusion[J]. Foreign Affairs, 2020, 99(5): 35-45.
[24] 约翰·米尔斯海默 . 大国政治的悲剧 [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16.
[25] 高尚涛 . 相互依赖框架下的美国对华战略分析 [J]. 外交评论（外交学院学报），2010，27（5）：76-90.
[26] 王岚，盛斌 . 全球价值链分工背景下的中美增加值贸易与双边贸易利益 [J]. 财经研究，2014（9）：97-108.
[27] 聂飞 . 制造业服务化抑或空心化——产业政策的去工业化效应研究 [J]. 经济学家，2020（5）：46-57.

A Study on the Impact of Asymmetric Interdependence and Conflict Between Chinese and American Industries

LI Wen-qi, XIA Min
(Schoo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enmin University of China, Beijing　100872)

Abstract: In recent years, the global industrial chain is undergoing structural changes. Under the impact of the current wave of anti-globalization, the US government is trying to reduce its dependence on China's supply chain, and has introduced a series of measures to deal with China's threat and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US technolog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represented by exports of higher value-added products, the growth rate of added value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has maintained rapid and stable increase in recent years, China has become a new center in the complex global value chain through rapid industrial upgrading. The upgrading of China's manufacturing industry and the deepening dependence of the US on China have changed the interdependence between the US and China. The increasingly fierce industrial competition between China and the US has an important impact on the formation of the advanced manufacturing strategy of the US. China should strengthen the development of core science and technology, stimulate the vitality of innovation ecosystem through international and domestic double circulations and move up the global value chain.

Keywords: Sino-US relations; industrial chain; industrial upgrading; unsymmetrical interdependence